

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的现状其原因分析

李洪波,王梦琳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台湾威权体制的瓦解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女性日渐成为台湾政治运作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方面,得益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及台湾民众深厚的“悲情意识”,女性参政情况得到有效改善,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政治生活,甚至进入政治决策核心。女性特有的政治魅力对于政治斗争的降温、政治僵局的化解起到特殊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了台湾政治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观念、大众传媒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参政比例偏低、参政代价较大等不足,对女性切实发挥参政议政作用造成严重制约。

关键词: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威权体制“悲情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6)04-0029-05

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终于尘埃落定。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以高票当选,成为新一任“台湾总统”,也使台湾政坛诞生了第一位女性“总统”。在本届“总统大选”中,台湾地区的女性政治人物格外活跃。除“笑到最后”的蔡英文外,洪秀柱也曾一度代表国民党参选,成为国民党首位女性“大选”候选人。可见,台湾政坛中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及政治权力的增强不容忽视。在本文中,笔者顺应当代女性主义学术思潮,针对女性参政中的最高层面,即女性权力参与问题,来分析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这对于了解台湾政坛中的两性差异,预测未来政局走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台湾女性权力参与简况

女性参政指“女性有意识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其根本目的是体现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群

体意识,反映妇女在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和利益诉求”^[1]。具体表现为2个层面:一是民主参与,指女性行使法律所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权力参与,主要指妇女参与竞选或加入政府工作,以此影响政府政策。这是女性参政的最高层面,也是衡量女性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2]。本文对台湾女性参政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权力参与层面,关注妇女投身政治领域参选公职人员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行为。

(一) 发展历程

台湾地区女性权力参与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该过程与台湾威权体制的瓦解几乎同步演进。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湾岛内处于军事戒严时期。尽管在“行宪”的名义下,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地方部分公职选举,少数妇女代表得益于妇女保障名额制度而当选,但其政治上的象征

收稿日期: 2016-05-02

作者简介: 李洪波(1971—),男,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王梦琳(1988—),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3]。1970年代,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当局为换取岛内民众的政治支持释放出部分政治资源,加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台湾地区女性参政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定期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和原有的地方选举给女性参选公职人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台湾妇女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以1987年解除戒严为分水岭,台湾当局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台湾的政治体系全面开放,政党政治逐步成型,开始走上政治自由化的道路。政治机会的增多直接推动女性参政取得可喜进展,女性在台湾政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 主要类型

台湾政坛中,蓝绿阵营均不乏女性从政的身影,她们或以悲情的形象获得选民的同情,或以犀利的语言吸引大众的目光,或以出色的政绩赢得社会的认可,成为台湾政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由于不同的出身背景、迥异的个人经历,台湾女性进入政坛的原因多种多样,形成了台湾地区女性参政的不同类型。

1. 依附型。早期台湾女性参政时,受限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各级选举的主要动员方式仍以血缘、亲缘等感性支持的初级社会关系为主^[4]。在该政治生态环境下,女性在政治上基本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必须依附男人才能在政坛有所作为。台湾第一位女县长余陈月瑛就是仰仗着其公公余登发的雄厚财力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开启政治生涯,并崛起为绿营在高雄县的重要指标人物的。可见,若不是以实力强大的政治家族为后盾,毫无政治经验的余陈月瑛几乎不可能进入台湾政坛。

2. “代夫出征”型。所谓“代夫出征”是指,“原来的男性参选人因某些原因无法继续参加竞选,而改由其妻‘代打’”^[5]。台湾第一位女性“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就是在丈夫郑南榕因被国民党当局以叛乱罪起诉自焚后,代夫竞选“立委”,以“台独烈士遗孀”和“政治受难者家属”的形象博得选民的同情,以高票当选。可见,“代夫出征”的女性政治人物优势明显,其不仅拥有被迫害的悲情形象,更可获得丈夫所在地方派系的大力支持,加之在陪同丈夫参加竞选活动中积累

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知名度,她们极易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政治活动的赢家。

3. 自我奋斗型。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逐步改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女性开始凭借自身实力参与政治活动。台湾不少女性政治人物是靠着自身杰出的学历背景、过硬的专业技能、丰富的政治经验,一步步在政坛闯出一片天地的。比如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她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教书。1994年她以学者身份踏入政坛,被聘为“陆委会”咨询委员,先后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立委”“党主席”等职^[6]。这类女性政治人物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身政治意愿,切实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二、台湾女性权力参与现状

(一) 取得的成就

一是参政人数持续上升。女性参政人数的高低取决于所在政治体制给予的政治空间。以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为例,女性代表的参政人数以1990年为界发生明显变化。1990年代以前,女性“立委”的参选率和当选率大体不变,普遍维持在10%左右,这得益于妇女保障名额制度^①。而1990年代后,台湾地区开始的政治转型使女性参政的诉求合法化,各级公职人员的定期选举则提供了女性对其参政权进行实践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参政意愿得到极大鼓舞,女性“立委”人数呈上升趋势,占全部“立委”人数的比率从第四届“立委”选举时(1992年)的10.55%上升至第六届时(2004年)的20.88%^[8]。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台湾地区113位“立法委员”中女性“立委”为38位,占全部“立委”人数的比率达到33.36%。此外,“考试院”女性“考试委员”的比率为42%，“监察院”女性“监察委员”的比率更是高达55%^[9]。可见,在社会性别平等化趋势下,台湾女性的政治空间将进一步开放,未来台湾女性政治力量的增长可以预期。

二是职务层级有所提高。台湾地区女性参政存在“三多三少”问题,即“虚职多实职少,副职多正职少,边缘部门多核心部门少”。但随着近年来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女性能力的提升,台湾政

坛涌现出一批“位高权重”的女性精英。前有台湾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吕秀莲,而目前风头正劲的蔡英文,更是女性政治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从大学教授、陆委会主席、“立法委员”、民进党主席一直到台湾有史以来首位女性“总统”,蔡英文一步步证明了女性政治人物的不俗实力。上述现象说明,台湾民众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摒弃了对女性参政的偏见,在“能不能接受女性当领导人”方面取得突破。

三是议题影响不断扩大。根据美国立法学者裘威尔的研究,“立法人员因其所占据的位置引起选民、政党以及游说团体对其权利、义务与职责的角色期待”^[7]。的确,在台湾政治体制中,“立法院”也无疑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台湾女性“立委”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其特色鲜明的提案也受到普遍关注。未来,随着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政治权利的增强,女性话题和民生议题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二) 存在的问题

一是女性参政绝对人数增多,但相对人数仍然较少。虽然台湾地区女性参政人数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实际情况并非数字上看起来那么乐观。因为,女性的参政比例仍然远低于她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据台湾当局内务部门发布的户籍人口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底台湾女性人口首度超越男性,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50.1%和49.9%。2014年8月,男性人口更是进一步减少^[8]。可见,在台湾女性参政人数增多的背后,是女性人口数量的更大幅度的增长,体现出女性参政人数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是女性参政意识加强,但政治素质偏低。尽管台湾女性的参政意识普遍增强,但女性整体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阻碍了其政治素质的发展。对公共权力的态度取向及参与能力是评价政治主体政治素质高低的关键要素。据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选举行为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女性政治态度保守,难以提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政治主张^[9]。此外,参政女性极少利用其政治身份为女性群体谋利益,因此难以获得女性群体的信任和支持^[10]。这样“在参政女性与女性群体之间就形

成了政治意识断层,不仅背离了女性参政的宗旨,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拉大了女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距离”^[11]。

三是女性政治精英频出,但参政代价较大。自涉足政坛始,台湾女性政治人物就开始与男人们一较高下。经过数十年的打拼,她们开创出一片天地,涌现出不少政治精英。但在光辉的政治成就背后,台湾女性为从政付出了不少代价。由于参政女性承担着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活跃于政治舞台,承担着极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12],因此,参政女性中婚姻破裂者不在少数,有些干脆选择不结婚^[13]。

四是女性参政环境得到改善,但政策条件不够理想。随着台湾地区政治体系的逐渐开放,女性参政机会大大增加,参政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但不论在制度设置还是法律规定上,台湾女性参政均存在着不小的阻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惠馨曾指出,“台湾法律条文中有许多看似对妇女公平,实则不平等的法条”^[14]。例如,台湾法律保障女性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并明确要求了妇女参加选举的保障名额。该规定的确对妇女参政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任何逾越该规定的女性当选人数都会被认为是“非法”^[9]。

三、影响女性权力参与的原因

(一) 促进因素

1. 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一般而言,“民主化指社会各族群有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开放的政党竞争,公开定期举行的公职人员选举及言论、出版、集会等”^[15]。政治民主化对女性权力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民主化对人民平等参与决策过程的提倡使妇女进入政治领域的要求合法化。其次,民主化通过定期实施选举,直接增加了女性进入政治领域的机会。再次,民主化推动党禁开放,“政党竞争可以开拓女性争取政治代表的新场域”^[16]。

2. 女性特有的政治魅力。在女权主义的众多流派中,文化女权主义注重“以爱施以道德关怀”,认为女性更注重创造和保持同他人的亲密的和关怀的关系。的确,与男性相比,参政中的女性拥有独特的魅力。她们亲切的目光、得体的

笑容、优雅的举止,往往构成政治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线,其影响力“润物细无声”般印刻在公众的心目中,为其取得政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台湾地区的政治活动中,由于政党之间的政治恶斗盛行,女性富于亲和力的政治形象有利于取得民众的信任。

3. 台湾人深厚的“悲情意识”。台湾人长期以来就有被抛弃、被迫害的“悲情意识”。所谓“悲情意识”,是指台湾民众因受到“委屈”“打压”而产生的一种或悲或愤的情结^[17]。目前,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已经与台湾政治紧密结合,而女性柔弱的形象正好迎合了台湾社会的弱势关怀的道德特质。“代夫出征”的女性政治人物就是台湾社会“悲情意识”的典型受益者。

(二) 阻碍因素

台湾地区女性参政情况虽已取得可喜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作为第一个以要求参政为目标的政理论,女权主义的不同流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女性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男女政治参与权的完全平等。

1. 经济制度的禁锢是根本障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女性政治地位不平等因素的分析中均着眼于社会经济制度。两者均认为,女性自身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女性只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受困于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投入到公共政治活动中,因此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目前,许多台湾女性在经济上仍无法独立,因而缺乏参政的底气。

2. 传统观念的束缚是思想根源。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两性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于传统文化观念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及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形象是一种典型的贤妻良母角色,而男性则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使得台湾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全身心投入政治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排斥女性参政的社会偏见和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为女性自身的心理定式,形成了女性对权力参与的漠视态度,从思想根源上降

低了女性的参政意识。

3. 生理因素的制约是内在因素。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受限于生理因素而在政治参与中处于劣势。因为政治参与是一项需要体力和脑力的活动,而与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男性相比,女性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在长达10个月的生育期中,女性必须面临体质变弱、工作能力下降的不利影响,在随后的哺乳期中,很多女性也被束缚在家中抚育孩子,仍不能完全回归到工作状态中。即便过了哺乳期,女性还必须在照顾家庭生活方面花费更多精力,“身兼数职”使女性身心俱疲,不利于女性参政。

4. 大众传媒的误导是外部因素。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普遍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之一。一位西方女性从政者说,“媒体既能造就也能摧毁一个女性从政者”^[18]。的确,在台湾社会中,媒体对女性参政的影响也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大众媒介是女性表达政治诉求、了解政坛动向的重要途径,对女性参政发挥着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所宣传的消极的价值取向、信息内容等也对妇女参政起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一些新闻媒体在报导从政女性时,“八卦”新闻往往充斥其中,很难将视角集中在参政女性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上。

四、结语

总体上看,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入人心,台湾女性权力参与正在不断发展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政治运作中,仍充斥着悲情式、民粹式的政治动员;在政治参与的实际条件中,仍然存在出身背景比个人能力更重要的现象;在选举过程中,宗亲关系、地方势力更是赢得选举的必要因素,选举制度的制订也仅仅是从保护而非鼓励的角度对待女性参政。因此,当前台湾女性参政现况只是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若要完全实现男女参政权的平等尚需时日。

注释:

① 见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选举简介》,1950年。

参考文献:

- [1] 吕亚力. 政治学[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社, 1984. 61-62.
- [2] 于筱莹. 基于社会性别与分层视角下我国政治权力参与问题的思考[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0, (4): 99.
- [3] 吴军民. 台湾妇女参政问题探析[J]. 台湾研究, 2002, (4): 42-46.
- [4] 司马岩. 台女性从政代价不小[N]. 环球时报, 2006-03-01.
- [5] 台政坛代夫出征的女人们: 不只是悲情意识[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tw/news/2009/11-27/1987381.shtml>, 2009-11-27.
- [6] 吕存诚. 民进党五都选举候选人[J]. 台湾工作通讯, 2010, (7): 36-37.
- [7] 罗传贤. 立法程序与技术[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社, 1998. 391-392.
- [8] 工商时报. 统计显示 2013 年底台湾女性人口首度超越男性[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1-18/5752347.shtml>, 2014-01-18.
- [9] 周群英. 台湾妇女参政的现状和不足剖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5, (2): 44-45.
- [10] 徐春华. 女性参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04, (5): 46-48.
- [11] 崔榕. 对女性参政的新思考[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 36.
- [12] 张永英. 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与妇女参政——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4, (4): 33.
- [13] 刘雅男. 台湾最有权势四女人: 从政道路各异 感情都曾受挫[EB/OL]. 央视国际网, <http://news.cctv.com/taiwan/20061230/100018.shtml>, 2006-12-30.
- [14] 仪纓. 台湾妇女研究论点简述(下)[EB/OL]. 中国干部学习网, <http://study.ccln.gov.cn/fenke/she-huixue/shxkdt/shyjs/82782.shtml>, 2014-06-13.
- [15] 孙关宏. 政治学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415-416.
- [16] 周碧娥. 台湾妇女与政治: 1985~1994[A]. 妇女研究十年——妇女人权回顾与展望论文集[C]. 1996. 127-151.
- [17] 罗会钧, 王栋梁.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 缘起、影响及其化解[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0): 104.
- [18] 姜殊. 分多少权力给女人[EB/OL]. <http://www.china-gad.org/Treasur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76>, 2004-03-09.

The Status Quo and Reasons of Femal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of Taiwan

LI Hong-bo, WANG Meng-lin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Femal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of Taiwan started in 1950s or 1960s. With the collapse of Taiwan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feminism, female factor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On one hand, benefited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ad consciousness" of Taiwan people, the situation of female power participation has been improved. More and more women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some of them even reached the core of the policy-making system. The special charms of women may be capable of releasing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breaking ice, thus promotes the posi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However, restricted by some negative factors as social economic system, traditional conception, mass media and so on, the process of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was not smooth, for example, the low rate and high cost of female power participation, which affects full play of women's role in this area.

Key words: Taiwan; femal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authoritarian system; "sensibility"

(责任编辑: 鲁玉玲)